

中 · 华 · 文 · 史 · 资 · 料 · 精 · 华 · 本

百年文史写真书系



名人子女忆父亲

慈父遗爱



K820.7
06

00123877



北航 C0542071

名人子女忆父亲 慈父遗爱

出版说明

20 世纪去了，21 世纪来了。过去的世纪需要回顾，需要温习，新来的世纪应当展望，应当奋进。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温习是为了进一步奋进。为了回顾，回顾上一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沧桑巨变；为了温习，温习上一世纪中国先贤们的奋斗历程，我们选编了这套《百年文史写真书系》丛书。

这套丛书共分 8 册。分别是《硝烟弹痕》、《漩涡沉浮》、《机诈权变》、《淘金旧梦》、《文坛档案》、《学林碎影》、《丹青风骨》、《慈父遗爱》。书中的所有文章均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和各种专辑史料中选出，这里有军事、政治、经济，有文化、科学、艺术，所有文章都是历史当事者和见证人的回忆。这些回忆具有“亲历、亲见、亲闻”的特点，构成了 20 世纪活的历史。

编 者

2001 年 1 月

FN 34/41 #04

目 录

1	永在心头的温暖 (马约翰)	马谕伦 马启勛
6	老报人王芸生	
	——回忆我的父亲	王芝芙
40	我的父亲包尔汉	伊丽菲拉
50	爱国主义学者白鹏飞	白璧
72	帆先父司徒美堂	司徒柱
78	先父朱启铃	朱海北
87	怀念父亲朱蘊山	朱明
92	回帆父亲孙兰峰	孙本淑
96	父亲永远活在我心中 (孙晓村)	孙阳生
101	我的父亲 (陈嘉庚)	陈国庆
107	缅怀我的父亲张自忠将军	张廉云
113	情系万安 (张西曼)	张小曼
129	注事历历帆父亲 (杨杏佛)	杨小佛

- 134 缅怀父亲杨虎城将军 杨拯民
- 141 追忆父亲吴耀宗 吴宗兰 吴宗素
- 148 慈父的遗爱（邵力子） 邵伟真
- 156 悼念先父范文澜同志 范元绶
- 161 我记帆中的父亲（周映彤） 韩素音
- 168 父亲郁华殉国五十周年祭 郁隽民等
- 177 我最爱的阿爹（季方） 季明
- 184 青少年时代愉快的回忆（柳亚子） 柳无忌
- 191 我的父亲赵元任 赵新那
- 208 怀念我的父亲钱昌照 钱士湘
- 212 追求真理做真人
——怀念我的父亲陶行知 陶晓光
- 234 爸爸和我（涂斐鸿） 徐静斐
- 276 怀念爸爸涂伯昕 徐星钊 徐敏

永在心头的温暖

马谔伦 马启勋

四女马谔伦的回忆：

离开老家远嫁海外已近半个世纪，卧房床头挂着父母亲在颐和园长廊下的合影，书桌玻璃板下放着多张爹爹的照片：爹爹在清华园老家书房内聚精会神地编写着教材，在新林院中舞剑，在客厅内怡然自得地拉着小提琴，妈妈在荷花池旁的情影等，它们每天都带给我一股温馨的回忆。虽然爹爹妈妈已离开这世界 30 多年了，他们的爱与精神却是那么深刻隽永地伴随着我，不断鼓励我对人生的信心，不论境遇顺逆，都能维持我内心的平安与快乐。

回忆我 7 岁开始学弹钢琴时，爹爹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第一次在十字布上绣花时，也是他提示起针的。对我来说，他琴棋书画无艺不通。每晚我们四个年幼孩子上床睡觉时，他会在床边轻轻弹奏他拿手的“曼德林”，催使我们进入甜蜜的梦乡。我最喜欢听他轻轻弹那首他自作的曲调……345-1635-1345-1634-1444-15-6-11-5-1……到现在我偶尔失眠时，还自哼此调进入梦乡。

爹爹又喜欢摄影，常常为我们八个兄弟姐妹照相，并在他自设的暗室中冲洗底片或上色。有时我哥哥们顽皮闯祸也会被关在这间黑房内。

永在心头的温暖

他还喜欢为我们一群孩子（包括清华园邻居小朋友们）讲侦探故事，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他看书过目不忘，阅后可将曲折的情节浅显而又清晰地讲给我们听，讲到紧张可怕的关头，我们小姐弟会挤成一堆咬着手指聆听！

我们的妈妈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与当时在邻校圣约翰大学就读的爹爹相识恋爱而结婚。她是一位不轻易说话但总是笑眯眯的温柔女士，因肤色较深在校时有“黑牡丹”之称。在清华住了几十年仍然脱不了一口上海音。她本是娇生惯养的小姐，但遇到危机困难时刻，她可以挺胸负起重担。回想八年抗战在昆明联大时期，她需清洗修补全家大小的衣物，烹煮饭菜准备三餐。当时教职员生活清苦，我们的配粮是洗不清沙石的红米，日常仅以咸咸的黑色大头菜炒大黄豆芽佐餐，到年节时才有肉吃。在通货膨胀压力之下，每月发薪，她都要精打细算为全家筹划开支预备日用。再加1939年我大哥启华因体弱营养不良去世，妈妈强忍悲痛直到抗战胜利回到我们可爱的清华园。她一生照顾我爹爹无微不至，自己省吃俭用使丈夫健康有精力来工作服务。妈妈还弹得一手好钢琴，常与爹爹合奏，也是我最美丽的回忆。

再说我们八兄弟姐妹四男四女，妈妈一直很引以为荣地说自己有“四对儿女”！四个大的自成一组看不上我们四个不懂事的小孩（我是老七），他们四个大的总想甩掉我们自己去玩，我们就硬追，在清华园各角落乱跑乱冲，当时同学形容为“马队”！记得有一次我们大声闯进图书馆里寻兄姐，被管理员截住训诫一番，结果哥哥们还被爹爹打了手掌。太多太多讲不完的事，有甜的有苦的，这一切一切都暖暖地藏在我心头。

写到此想到爹爹关于体育方面的学术理论“Transfer Value of Physical Education”（体育的迁移价值）也施诸于他和妈妈对家庭子女的爱及教育，并转移到我们这下一代来。我们现在仍生存的六位兄弟姐妹都拥有

快乐的家庭生活，皆由于我们有意无意间效法了父母的模范以信望爱为做人原则。我们年轻时爹爹管教极严，记得天黑后他就不准女儿外出。当时在昆明，我的爱人钱明年仍在追求我的时候，一天他约我去南屏戏院看工余晚场，爹爹说天黑了不准与男朋友单独外出。钱明年即刻解释说“白天电影院内也是黑的，请你相信我，我会尊重马家小姐的”。爹爹欣赏他有君子风度和胆量直言，就鼓励我与他交往了。

我于1950年离开清华去东京与钱明年成婚。那时我的二姐佩伦亲自一路护送我到香港登船，陪伴了我一个月。她为了妹妹牺牲了照顾夫君牟作云与两位年幼的儿女，我是一生感激她们的。由此更使我深深体会到爹爹妈妈的爱是如何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了。我和明年也效法他们爱主、爱人民、服务社会，我们的子女以至孙儿辈也都以“马氏教范”为荣。

三子马启勋的回忆：

中国的国内战争使我和我的新婚妻子离开了我的父母和全家。

43年后，1992年10月我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了我的出生地。我们从旧金山飞抵北京后，就直接来到了清华大学。我们这次访问并非为了团聚，而是怀着极深的感情来参加由清华大学举办的，为纪念我父亲110周年寿辰的纪念会。上百人聚集在装饰着鲜花和历史性相片的大厅里，缅怀父亲的过去，缅怀他在教学上的成就和在提高体育对增进健康和优化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及对其全面认识上的贡献。

我的父亲马约翰教授毕生献给了清华大学的体育教育事业，他是中国最受尊敬和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也是中国近代体育建设的缔造者和奠基者。他长期担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主席以及中国奥林匹克代表队的总教练，并拥有许多的荣誉称号。然而在他繁忙的时期里，他的心时刻离不开清华，那里是他真正热爱的和感到宁静和永恒的自己所归属的唯

一的地方。

我的父亲中等身材、体魄健壮，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一个对不公平的挑战从不畏惧的意志坚强的人。他曾提出“五项运动道德品质”的口号，目的是希望通过“体育的迁移价值”的实践作用，使社会道德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五项运动道德品质之一是：“公平的竞赛”；另一个是“不要找借口”。他作过一个简单的解释说：“一个网球运动员在打了一个坏球之后，经常看着自己的球拍，实际球拍并没有问题，是运动员技术上的错误而造成了这个失误。”他继续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有些人做错了事后，总是提出一些理由作为借口。”“奋斗到底，绝不放弃”虽然是运动员的一项道德品质，但在生活实践中它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途径。这“五项运动道德品质”为许多人所赞赏并遵循。父亲说：“一个人可以输掉一场比赛，但永远不能输掉运动道德。”他相信通过体育活动可以培养和发展人的健康、优美、勇敢、进取的美德。他还认为体育是一门科学，它依次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艺术和音乐等密切相关。我父亲可以弹奏各种乐器，他创办了清华的管乐团，并教学生们如何演奏各种乐器。

在参加清华的纪念会后，我带领两个女儿去拜谒了她们的祖父母的坟墓，也到了在清华体育馆旁父亲生前办公室窗外，政府为他所建立的12英尺高的塑像前。孩子们含泪上前拥抱了塑像——因为他是她们从未见过的祖父。

父亲是20年代美国麻省春田学院毕业的学生，他也很爱这个学校，通常每隔三四年回去访问一次。春田对马家每一个人来说是一个熟悉的名词。我们的兄长启伟和姐夫作云都是该校的毕业生。父亲曾利用他的奖学金，从清华大学选送过十多个人，如夏翔、黄中孚等去春田学院进修学习，力图为此而加强国内体育教育的基础。

通过学习，了解和传授体育教育的真实价值，父亲度过了他的高质

量和丰富多彩的一生。对我来说，父亲就像远方天际的彩虹。每当高高地飞翔在蓝色的天空时，就梦想着跟随在父亲的后面紧紧地追逐那远在天边的彩虹。

永在
心头
的温
暖

老报人王芸生

——回忆我的父亲

王 芸 生

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闻人”

慈
父
遗
爱

从1938年到1946年初，整整七年，我们家一直住在重庆。我从懂事起，就是个小重庆人了。当时正是抗战期间，起初几年，日本飞机经常窜入内地狂轰滥炸，我们几乎天天要跑警报避空袭。我亲眼见过大火烧去半个重庆城，遍地倒着血肉模糊的尸体。有一次，我被闷在炸塌了的房子里，幸亏人小机灵，躲到写字桌下面，才算捡了一条命。很多日子是跟着母亲，拽着弟妹们钻进半山腰的洞里避难。我见别的孩子总是和父母在一起，生死与共，而我们的父亲却从不跟我们一起进山洞。我开始为父亲的安全担忧，可母亲却好像并不着急，她很坦然地告诉我们：“你爸爸每天都要写文章、出报纸，他不能和我们躲在一起，他必须呆在装有印刷机的防空洞里。如果要他停止出报来这里躲轰炸，才真是要了他的命啊！”出报纸竟然比生命还宝贵，这话时时在我脑际萦回，百思不得其解。

1941年底，母亲生下了最小的妹妹，我们兄弟姐妹就有六人了。我们仍然很少接近父亲。母亲按照她的方式训练我们：早晨起床不许发出任何声响，必须轻手轻脚地穿衣洗漱，然后拿上母亲头天晚上备好的干

粮去上学。中午放学回家，得先悄悄地看看母亲的表情，只要她轻轻一摆手，我们便知道父亲还没起床。

父亲一年四季都上夜班，总得半夜以后归来，多半都是凌晨两三点钟，甚至天亮才回来。父亲每天中午起床，匆忙吃上一小碗饭，便又去编辑部开碰头会，商定第二天报纸要目。每天都开这么个小会，他都十分严格地遵守，从不无故缺席。父亲还经常参加各样会议，会见各种人物，我们孩子自然很难见到他。也许正因为很少见面，父亲在我心目中成了个很神秘的人物，越是少见，也就越想见他。我有时背着母亲，偷偷推开房门看一眼正在熟睡的父亲，仿佛这也能加深些了解似的。每当吃晚饭时见到他，姐妹们总要缠住父亲问东问西。在姐妹中又数我最好多嘴，我曾怀着好奇心问父亲：“为什么每天非写社评不可？为什么你要会见那么多人？”父亲非常和蔼地向我们解释写社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时却风趣地说：“不写社评还是什么主笔啊？不会见各种人，还算什么新闻记者啊？如果我什么也不干，不就是失业了吗？”

渐渐地我听得到的议论多起来了。有时是老师，有时是同学的爸爸，他们常对我提起父亲写的文章。有一次，语文老师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小声对我说：“你父亲真厉害，敢捅马蜂窝，什么材料到他手里都能为炮弹。就连特务机关也得避他三分啊，真是能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听了这些话，我虽然好像明白了些什么，但仍觉得很费解。父亲是个文弱书生，又无一官半职，怎么会是个不一般的人物呢？

不久，我还真有所领悟了。听人说，有一次父亲参加国民党中宣部召开的每周记者招待会，发布新闻的一位少将，由于当时战事累败而对实情吞吞吐吐。记者提问，他总以“军事机密”为托词，不肯直言。记者们鼓噪唏嘘，在座的财政部长俞鸿钧、行政院参事张平群出来解围。父亲见大家不敢再说了，便拍案而起，顿足怒吼：“这是什么话？成什么体统？抗个什么战？究竟‘机’什么‘密’？简直气死人了！走，大

家都走！各位同业跟我走——散啰！岂有此理！”人们都说：“除了王芸生谁敢啊？有种有种！”

平时父亲在我们面前总是有说有笑，可有一次，我发现父亲连续几天总是板着脸不肯开口，甚至还会突然对母亲大发脾气。母亲很贤惠，能体谅父亲，她知道父亲准是遇到了不顺心的事，于是更加小心地安排家中的一切琐事，把孩子们打发得远远的，给父亲创造一个能静心思考的环境。我感到父亲心中有一团火，永远在燃烧，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凝结在事业之中，而我对他知道得太少了。

一天晚上，家里人睡着后，我悄悄溜出屋门，来到二楼编辑部。我站在门外，偷偷从门缝向里张望。这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坐了十多位编辑，正在紧张地工作。我默默巡视一遍，却不见父亲，心中正纳闷，忽见里面一扇小门被推开，父亲走了出来。他把几页纸送给一位叔叔，便又进了小屋。

原来父亲是在那间小屋办公。他每天总要先看新闻稿和办理各种杂事，直到审订完最后的新闻稿，才考虑写社评。他的思维非常敏捷，题目一经确定下来，很快就在脑中将文章构思好了。他写文章从不作大的返工，总是每写好一段，就送到排字房去，等文章全部写完，大样也就印出来了。每天不管多晚，父亲都必须亲自校完大样，再一次查看了整个版面安排，才会回家休息。

这一夜，我在门缝看了很久，本想等父亲下班一起走。可是我忽然发现编辑部内气氛大变：开始人们显出十分兴奋的神情，三三两两，窃窃私语；接着更加繁忙起来。我怕被人发现，只好先独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清晨，我刚走到报社经理部门前，发现大门口挤满报贩子，你争我抢，要求增加份数。拿到报纸的，喜气洋洋，边跑边喊：“看飞机洋狗事件！”“请看孔二小姐的洋狗坐飞机啊！”不一会儿，行人就把报童围得水泄不通。我眼疾手快，总算抢先买了一份。

打开报纸，我自然首先看社评。嗨！题目印得特别醒目《拥护修明政治案》。我这才明白，原来父亲为飞机洋狗事件很憋了几天气，终于找到了揭露的机会。他是趁国民党头一天通过了《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政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借题发挥，写了这篇社评。写到一半，笔锋一转，揭发了飞机洋狗事件。

大家都知道，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9日由港飞渝的最后一班飞机理应载来急需离港的各界重要人物。大公报派人到机场接总经理胡政之先生和报社从港撤回的机器，结果一样也没接到。而记者在机场见到的却是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子，由穿着西服孔二小姐神气活现地接运而去。父亲得知此事，闷闷不乐已有多日，这天总算找到个好时机捅了出去。

这个马蜂窝是一捅到底了。捅得孔二小姐大跳大闹，捅得重庆市掀起了学潮。各大中学校纷纷罢课，组织队伍上街游行，简直闹了个地覆天翻。最后蒋介石发了火，气往哪里撒呢？只好责怪教育部长郭泰祺没有管好学生，撤了他这个部长，也算出了口怨气。

这是多么辉煌的胜利啊！它使我开始明白了报纸这个工具的重要性。以后斗争的花样又在不断翻新。当我第一次见到报纸头版上出现一大块空白时，以为印报工人出了问题。父亲却摇着头说：“不，不，这叫开天窗！”此后，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越来越严，经常借故扣压社评，天窗也就不断出现。这实际上是对反动的新闻检查制度的一种抗议，读者完全心领神会，每次都纷纷来信来电支持报馆，并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卑劣行径。

1943年2月2日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国民党军政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我第二天知道了，就追问父亲是怎么回事。他苦笑着答对我说：“是头天社评招来的祸啊！”我听了很吃惊。那篇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写得很真实，头天有好几个同学的家长都

对我翘起大拇指，要我向父亲致意。我还没来得及谈呢，怎么又成问题啦！

1942年河南省大旱灾，饿死300万人，国民党政府还在向河南人民勒逼征粮，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很气愤。这篇社评在描绘了河南人民悲惨状况后，又写了重庆物价跳涨，阔人豪奢的情景，不正道出了百姓的心声吗？对如此明摆着的事实，国民党竟然企图否认，自欺欺人，实在可笑。我当即表示停报三天不要紧，第四天接着再来一篇更厉害的不就解气了吗？父亲苦笑着长叹一声：“哎！真是孩子话，很多事你还不懂啊！停报三天是一种‘惩罚’，说明老蒋已经很恼火了。”我说：“恼火了没关系，大不了关门呗！”父亲问：“关门以后怎么办呢？”我毫不气馁地嚷起来：“那就另办一家报纸好了。”父亲点头赞许地说：“你的精神值得赞扬，可事情能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吗？办一张报纸有许多困难，得到人民的信任更不容易，怎么能随意放弃呢？一家新报纸创刊，各党各派的人都睁大了眼睛望着，角逐竞技，一个不小心，吊销登记证就得关门大吉。我们办报纸的人也得讲点策略，不能一味乱打乱插，总得让自己有个立足之地啊！”说到这里，父亲无限感慨地连声叹息：“要想办一家新报纸，做个仗义执言的报人，谈何容易啊！”

我问父亲：“怎么才能做到不关门呢？”父亲耐心地解释说：“事情是很复杂的。蒋介石政府虽然独裁腐败，但他一直在搞些假民主以笼络人心。他对《大公报》必然要尽可能地利用。而《大公报》呢？为了保存自己，也要利用他的弱点。对他既不怎么驯服，也不能太过分。在适当时候捅他一下，给他一点压力，但还不能把事情弄得太僵，还要留有余地，以便经常能为百姓说话，不屈不挠地斗争下去。”

父亲追求真理，敢替老百姓讲话，敢揭露国民党的腐败，从不为权势所左右。但他也很讲究斗争策略。停刊三天，从表面看似乎报馆服输了，其实第四天能照旧出报就是胜利。报纸虽然哑巴了三天，他却又整

整忙了三天。他接待了数不清的来访者，阅读了大量群众慰问信、慰问电。

父亲爱打笔仗，不仅跟国民党打过，也和共产党打过，还和各式各样的人物打过。当年父亲在天津为《华北新闻》写社评时，就是由打笔仗而和《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先生相识的。

当年，北伐军打进南京，放火烧了各国领事馆。第二天，《大公报》发了社评，认为中国人自己搞革命，不应该烧外国领事馆。《华北新闻》则赞扬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行动。转天《大公报》针对《华北新闻》又发表了一篇社评，重申犯了错误应该严厉责备自己，不能责怪别人。父亲见《大公报》冲着他来了，自然不肯示弱，转天又登了一篇题为《中国革命的根本观》，阐述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尽洋人欺压，因而民不聊生。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于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对内平息内乱，打倒军阀。至此《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先生就停止了笔仗，从侧面打听出在《华北新闻》写社评的是王芸生，便主动约他见面，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季鸾先生是一位充满仁爱的长者，才情横溢的名士，也是刚直不阿的硬汉。他十分爱惜人才。父亲刚进报馆时还很年轻，张先生就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先让他独立编地方版，而后又令他撰写社评，不几年就将重担移至父亲肩上。他虽然不怎么动手，但经常给予重要的指点。

张先生是父亲感激不尽的恩师和挚友。父亲常和我们谈起他的聪明才智，总惋惜他去世太早。父亲临终前多次提起为张先生写传的事，责怪自己没能抓紧时间提笔，是他此生最大的遗憾。感慨之余又一次用断断续续的语言，给我讲起了季鸾先生临终前给他的最后一次高明的指点。

那是1941年在重庆，当时日军飞机整日搞疲劳轰炸，一日数次空袭。终日蹲在防空洞里的百姓甚感沮丧，父亲为此心中十分烦闷，但又

想不出鼓动人心的好办法。季鸾先生一听此事，立即有了主意，他神采奕奕地说：“芸生，不用发愁。你就赶快写文章吧，题目就叫《我们在割稻子》。”父亲一想对啊，四川确实连年丰收，当时又正是收稻季节，何不就题发挥呀！这篇社评登出去之后，读者纷纷赞颂说这是一篇鼓舞人心的好文章。

父亲不仅在报纸上经常打笔仗，在书信中也好打笔仗。只要接到一封与他意见针锋相对的信，他必定马上写回信。甚至急到不许送信人走开，一定要来人等着把回信带走，哪怕为此要付给来人许多小费，他也从不放在心上。

父亲始终一往情深地热爱着、眷恋着办报纸，有时简直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他曾风趣地说过：“正如采访新闻要有新闻鼻子，编辑要有新闻脑袋和新闻眼睛一样，我早已是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了。”

俭朴耿直 光明磊落

父亲出身贫苦，从小养成了俭朴的好习惯。他不喝酒，不吸烟，甚至连茶也不喝。他长期上夜班，每晚工作完后，虽已筋疲力竭，但却不在外面吃夜宵。回到家来，只要有几块饼干和一杯白开水打发肚皮，就很满足了。

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家中孩子又有六个之多，光靠父亲一人的薪金过活，生活自然过得十分清贫。在重庆的那几年，父亲总是穿着一件虽然很旧却很整洁的长袍。我们姐弟六人的穿着，多亏母亲终日缝缝补补，倒也还像个样子。我记得内衣内裤有的是用报社处理的油墨布做的。虽然事先已用碱水洗过多次，字迹已很模糊，穿在身上仍然散发出刺鼻的油墨味。我很怕同学们发现会笑话，总把外衣捂得严严的，决不让它露出来。